臺大歷史學報第 60 期
2017 年 12 月，頁 159-191

BIBLID1012-8514(2017)60pp.159-191
2016.8.26 收稿，2017.6.7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60.04

夷狄無百年之運
——運數論與夷夏觀的分析

方 震 華*

提 要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以「運數」解釋政權興衰的說法。此類運數之說，多半針對個別政權而產生，流傳一段時間後，就為人所淡忘。不過，「夷狄無百年之運」恐怕是其中的例外。此一理念出現於南宋後期，後來廣泛被明代官員和文人引用，其影響力更及於中國之外的地區。就史實而言，外族政權存在的時間長短互異，並無規律可言，為何到了南宋，會有人認為夷狄政權無法成立超過一百年？本文從分析「百年之運」一詞的意涵衍變入手，指出「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是因金朝的衰亡，而在南宋後期出現。南宋士人藉此運數之說，強調外夷政權不受上天庇祐，只有正統所在的南宋才能長期延續。元朝雖滅南宋，但並未干涉士人繼續傳播尊中國、貶外夷的觀念。等到元末大亂，朱元璋以「胡無百年之運」進行宣傳，指蒙元的運數已盡，漢人將重掌政權，促成此一理念在明代的流行。滿洲人入主中國後，雖力圖打壓漢人的夷夏觀，仍不足以阻止「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的流傳，清末的革命運動仍藉此宣稱滿清氣數已盡。

「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之所以能夠持續且廣泛的流傳，並非此說符合中國與外夷互動的「歷史規律」，而是因為此理念具有普遍性意涵，可在不同時代被政治人物利用；至於歷史真相為何，傳述此說者並不在意。因此，「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在中國的流傳，正是政治宣傳影響歷史論述的一個實例。

關鍵詞：運數　夷夏觀　南宋　朱元璋　元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chfa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百年之運」的意涵
二、「無百年之運」的出現
三、南宋以後的流傳
結 語

前 言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以「運數」或「天命」來解釋政權興衰的說法，在朝代終結後，以運數或天命早定之說，來解釋王朝滅亡的原因。這些說法多半是針對單一政權，往往在流傳一段時間後，就為人所淡忘。[1]不過，「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恐怕是一個例外。此一理念出現於南宋後期，後來廣泛被明代的政府和文人所引用，導致其影響力更及於中國之外。例如：18 世紀朝鮮君臣在討論清朝國運時，就經常引用「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預言其未來的命運。[2]顯然，此一斷言夷狄政權無法延續超過一百年的說法，可以套用於不同時期的非漢人政權，所能產生的影響力自然不是其他運數之說可以相比。不過，現代學者雖然熟知「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卻從未分析這個理念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形成，也未曾討論此一說法的流傳過程與所產生的各種影響。

就古代中國的夷夏關係而言，外族建立政權，對於中國構成威脅，可說由來已久。外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其存在的時間長短互異，並無

1 在中國傳統文獻中，以運數、命定之說，主張朝代興亡不由人力的說法，不僅數量眾多，且由來已久，僅舉唐代李延壽對於南朝陳滅亡的評論為例。據說王導在東晉初年向郭璞詢問其家族的未來，郭璞回答：「淮流竭，王氏滅。」至陳朝滅亡之年，淮水枯竭，李延壽據此而宣稱：「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見李延壽，《南史》（臺北：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卷 24，〈王淮之傳論〉，頁 667。

2 參見莊吉發，〈他山之石——朝鮮君臣論盛清諸帝〉，收入李國祁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 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規律可言，為何到了南宋，會認為夷狄政權無法延續超過一百年？又為何是「一百年」，而非其他的數字？此類運數之說雖帶有先驗或預言的色彩，但並非憑空虛造，能夠長期流傳，更須有現實環境的配合。因此，若能追溯其形成和流傳的過程，既可以觀察古代中國夷夏觀念在宋、明之間的改變，也能理解中國歷史上運數論的形成方式。

本文將從分析「百年之運」一詞意涵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入手，探索「夷狄無百年之運」一說的由來，並從宋政權與外族的互動關係來分析其出現背景，再討論此一說法在南宋以降的流傳與被政治人物運用的狀況，顯示其產生的具體影響與歷史意義。

一、「百年之運」的意涵

從現存文獻看，以「百年之運」一詞來解釋外族政權的盛衰，始於東漢班固（32-92）在《漢書》中總結西漢與匈奴關係史的長篇史論，其中提到宣帝（91-48 BC，74-48 BC 在位）時期，匈奴單于入朝向漢帝稱臣：

>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隙，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耘庶亡干戈之役。[3]

這段文字意指宣帝之所以能夠令匈奴單于俯首稱臣，一方面是奠基於武帝（157-87 BC，141-87 BC 在位）時期的多次攻伐，同時也是因為「直匈奴百年之運」，即利用匈奴內亂衰弱的機會，施以適當謀略，終使單于長期臣服，邊境復歸平靜。不過，上文中「百年之運」一詞的確實意涵為何，並不容易理解。

3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點校本），卷 94 下，〈匈奴傳贊〉，頁 3832-38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代以後的文士相當重視班固對西漢與匈奴關係的評論，唐代杜佑（735-812）編《通典》，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編《太平御覽》，都完整收錄班固的史論。[4]甚至引用其觀點，作為處理對外關係時可參考的前例，例如：會昌五年（845），宰相李德裕（787-850）為唐武宗（814-846，840-846 在位）撰寫，頒給沿邊各節度使的密詔，一開始就說：

>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櫜弓矢，保乂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開，此遭遇其時也。[5]

引用班固的文字，將漢武帝與漢宣帝在應付匈奴上得到的不同結果，解釋為遭逢的時機有異所致，藉此強調對外族的政策必須視其盛衰變化的時機，進行適當調整，才能達成預期的效果。李德裕藉此強調武宗的對外政策是順應情勢，維持邊境和平而非對外發動戰爭。

也許是因為漢代以降的官員、文士對於班固的說法相當熟悉，乃使用「百年之運」一詞來指稱胡人政權的興衰。例如：隋代大臣楊素（544-606）所寫的〈出塞〉詩：「漠南胡未空，漢將復臨戎。……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6]顯然是引用「直匈奴百年之運」的典故，宣示胡族勢力將因漢族的征討而衰弱。唐中宗（656-710，705-710 在位）景龍四年（710），由蘇頲（630-737）撰寫，任命呂休璟等人北伐突厥默啜可汗的制書：

---

4 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點校本），卷 195，〈邊防十一〉，頁 5344-5347；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卷 331，〈兵部六十二〉，頁 1650-1651。

5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卷 7，〈賜緣邊諸鎮密詔意〉，頁 124。

6 郭茂倩輯，《樂府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汲古閣刊本影印），卷 21，楊素，〈出塞〉，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自默啜虔劉肆暴，桀驁反常，獨為匪人。假命驕子者，有歲時矣。雖奉書就邸，或遵於聲朔；而控弦犯塞，已毒於疆場。朕惟務懷柔，每存含忍。遂使庶邦憤積，稽其六月之師；逋寇禍盈，窮此百年之運。[7]

指突厥默啜可汗不遵從唐室號令，侵擾邊境，朝廷一直容忍，終致默啜罪積禍盈，其政權的運數將因唐軍討伐而到達盡頭。蘇頲在另一篇代宰相書寫討論月蝕之兆的奏狀中，將月蝕解釋為「胡滅之祥」，進而指稱天象所反映的現實狀況是「但恐默啜禍盈，命危勢蹙；百年之運，晷刻當窮；三象之微，蔽虧先肇」。[8]同樣以「百年之運」來指稱默啜政權的運數，指其即將滅亡。

到了五代十國與北宋前期，「百年之運」一詞由指稱胡族政權的運數，被文士用以描述己方政權所擁有的「天命」或「德運」。楚王馬希範（899-947）在後晉天福五年（940）曾於溪州立銅柱，所刻的記文中說：「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緜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9]以「九九百年之運」指稱馬氏政權所擁有的德運，指其將興盛於中國南部。北宋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太平興國九年（984），趙垂慶上書建議朝廷「改正朔，易服色」，將宋的德運由火德改為金德，以略過五代政權，上承唐代土德，太宗因而下令群臣討論宋代所繼承的德運究竟為何。徐鉉（916-991）等官員上奏，反對宋室直接繼承李唐的德運，認為「且五代運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

7 蘇頲，〈命呂休璟等北伐制〉，收入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459，〈翰林制詔四十〉，頁 2335。《文苑英華》繫此制於中宗景龍四年五月十五日，但其他唐代文獻皆未載是年唐軍曾對突厥用兵，可能是中宗隨後於是年六月被韋后毒死，唐中央陷入不安而終止討伐行動。

8 蘇頲，〈為宰相論月應蝕狀〉，收入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636，〈狀九〉，頁 3279。

9 王昶輯，《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 120，〈溪州銅柱記〉，頁 3。參見廖道南撰，《楚紀》，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48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李桂刻本影印），卷 23，〈昭文外紀前篇・李弘皋〉，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年之運？」[10]此處的「百年之運」一詞，其涵意顯然是指各朝代所擁有的「德運」，而不涉及政權的盛衰。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嘉祐四年（1059），同判宗正寺趙良規上奏倡議太廟祭禮的改革，奏書中說：「國家承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11]同樣以「百年之運」指稱宋室自立國以來所承繼的德運。

不過，「百年之運」並不專指國家或政權的命運，也可能用於指稱人的死亡。在一份墓主姓氏不詳的北周時代（557-581）墓誌中，作者對於傳主晚年的描述是：

> 既而門巢□鬱，百年之運已催；楹夢凝祥，九泉之路俄涉。春秋六十有三，遘疾，終於私第。嫡子脩文、脩禮，衰絰露節，痛結榮泉。粵以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於柬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禮也。[12]

以「百年之運」與「九泉之路」對稱，顯然用以指稱傳主生命的終結。不過，此一用法目前僅見於上述之例，看來並非常見的寫法。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自班固以降，「百年之運」一詞或泛指政權所具的德運，或用以指稱人的死亡，並無具體指稱「一百年國運」之意，與日後出現的「夷狄無百年之運」，在涵意上十分不同。將「百年之運」解釋為「一百年國運」，始於北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神宗熙寧十年（1077），蘇頌（1020-1101）出使遼國，在返國後與神宗討論遼的政治情勢：

> 頌曰：「通盟歲久，頗取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契丹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頌曰：「漢武帝自謂，

1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運曆1之1。

11 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點校本），卷189，「嘉祐四年六月」，頁4568。

12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北周「公諱通墓誌」，頁4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至宣帝，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州、七關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情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13]

蘇頌根據班固「匈奴直百年之運」的說法，指稱遼國的興衰有其定數，便涉及到此一「定數」究竟多長的問題。神宗質疑蘇頌的觀點，認為遼自耶律德光（902-947）南侵中原，滅亡後晉（936-946）政權後，至今仍為中國大患，其國運強盛早已超過百年，可見以「一百年」為期，來預測遼的盛衰之數並不準確。顯然，神宗對「百年之運」一詞的理解，已非泛指政權的德運，而是指「一百年的國運」，即將「百年」二字當作具體數字來理解。蘇頌沒有正面回應神宗的質疑，只是強調夷狄的興衰與叛服自有其規律，與中國國力的強弱或用兵征討與否並無關連。由此看來，蘇頌之所以提及《漢書》的論點，既不是要根據歷史的前例預言遼朝何時會衰亡，也不是要歸納外夷盛衰的「歷史規律」；只是強調外夷興衰自有定數，希望說服神宗放棄對外用兵的野心。

在北宋後期，藉由運數之說來反對用兵拓境的另一個例子是曾布（1036-1107）。哲宗元符二年（1099），章惇（1035-1105）建議出兵滅亡西夏，宰相曾布因而對哲宗（1077-1100，1085-1100 在位）論及，自己過去曾反對神宗對交趾用兵：

> 曾布再對，上〔哲宗〕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布曰：「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笑曰：「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寧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交人雖海隅尺寸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

1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84，「熙寧十年八月」，頁 69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14]

認為交趾雖小，但能立國百年，其興衰是由天數決定，並非人力所能滅亡。交趾尚且如此，何況是實力更為強大的西夏。曾布與前述神宗的言論皆顯示，北宋君臣雖以運數論來討論外夷的盛衰，但由於周邊的外族政權皆已立國長久，在此情況下，根本沒有出現「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的客觀條件。

等到女真崛起，建立金朝並佔有中原，南宋相對於外夷更居於劣勢，華夷關係的論述也反映此一現實。南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在位初期，主張恢復中原的趙鼎（1085-1147）等人「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15]不過，高宗別有想法。紹興八年（1138）八月，高宗在與大臣討論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5 在位）聯金滅遼之事時說：「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16]顯然，高宗無意為了收復失土，繼續與金人作戰；而是公開宣稱中國與外夷必須並存，猶如陽之於陰，即使軍力強盛如漢、唐之時，也不可能將外夷消滅，藉以合理化對金求和的政策。此種以陰陽觀念來解釋夷夏關係的說法，淵源於西漢時代即已出現的傳統思想。司馬遷在《史記》中說：

> 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17]

從地理位置與所對應的天象，將居於東南的中國視為「陽」，西北的各

1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17，「元符二年十一月」，頁 12301。

15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水心別集卷 15，〈外稟・終論五〉，頁 825。

16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21，「紹興八年八月」，頁 641-642。

17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點校本），卷 27，〈天官書〉，頁 13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外族視為「陰」。當陰陽觀念應用於描述中國與外夷之別時，可以進而比附於其他的相對關係，例如：西漢成帝（51-7 BC，33-7 BC 在位）時，杜欽因日蝕、地震之變而上奏：

>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18]

從陰陽的角度，將華夷關係等同於三綱中的君臣、父子與夫婦。如此一來，中國為君、為父、為夫，外夷為臣、為子、為妻，顯然是將中國的地位置於外族之上。相對地，南宋高宗儘管引用陰陽觀念來解釋華夷關係，卻並未尊中國、貶外夷；而是以陰陽並存為由，主張中國無法以武力消滅外夷，形成一種異於傳統的夷夏觀。

直到高宗在位的後期，他仍持相同的論點。紹興二十六年（1156），一向主張收復中原的張浚（1097-1164）上書，建議朝廷應以復仇為念，等待時機對北方用兵。高宗不認同此提議，對執政大臣表示：「中國之與夷狄，猶陰之與陽，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必欲無夷狄，亦無此理。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19]認為在道理上，不可能只有中國而無夷狄，即使北宋太祖（927-976，960-976 在位）擁有強大的武力，仍須與契丹維持和平。高宗這段談話，顯然是在宣誓繼續信守與金人的和約。國君既倡導於上，中國必須與外夷並存，就成為南宋流行的理念，朱熹（1130-1200）曾對學生提到：

> 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

18 班固撰，《漢書》，卷 60，〈杜欽傳〉，頁 2671。

19 呂中撰，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與《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合刊），卷 16，〈待夷狄〉，頁 688。呂中繫此事於紹興二十年，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史》不同，應有誤。張浚上書的內容，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75，「紹興二十六年十月」，頁 465-4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20]

此條為董鉄（1152-1214）所錄，是丙辰（寧宗慶元二年，1196）以後所聞。[21]可見至寧宗（1168-1224，1194-1224 在位）慶元時期（1195-1200），以陰陽之道並存為由，主張夷狄與小人皆無法消除，仍是常見的說法。

主張中國必須與外夷並存，卻不談中國尊於外夷，形同根本放棄對抗北方外族的責任，這是宋高宗統治的一項特色。[22]外夷既被視為應與中國共存，就很難出現宣稱外族政權不能延續超過一百年的說法。對於主張恢復故土的官員而言，此種理念模糊了華、夷之別，影響國家未來的發展，必須加以辯駁。葉適（1150-1223）的言論是一個例子，他在孝宗（1127-1194，1162-1188 在位）淳熙十二年（1185）批評：

> 豈可以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仇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23]

認為當時人高談追求堯舜與三代，實際上卻忽視夷夏之防與復仇之義，結果是安於偏安的現狀，與追求三代之治的理想形成矛盾。葉適兩年之後面見孝宗，在所上的奏劄中檢討導致恢復大業難以執行的各種因素，其中一項就是士大夫的議論：「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24]可見葉適對當時藉天意之說模糊華夷之別的論述，十分不以為然。不過，隨著金朝國勢在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走向衰落，宋人對夷夏關係的討論開始產生變化。

---

20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72，〈易八〉，頁 1836-1837。

2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語錄姓氏〉，頁 13。

22 參見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頁 278-283。

23 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 10，〈始議一〉，頁 758。關於葉適夷夏觀的詳細分析，參見近藤一成，〈宋代永嘉學派葉適の華夷觀〉，《史學雜誌》第 88 卷第 6 期（1979 年 6 月，東京），頁 51-79。

24 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 15，〈上殿劄子〉，頁 8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無百年之運」的出現

南宋寧宗嘉定後期，金政權在蒙古軍的強大攻勢下瀕臨滅亡的消息傳到南方，許多文官、士人引用《漢書》的典故來描述金朝的衰亡。例如：曾任參知政事的衛涇（1159-1226），為程卓（1153-1223）撰寫墓誌銘，一開始就說：「嘉定十六年四月，同知樞密院程公卓以疾不能朝。時國家值仇敵百年之運，疆埸大計委成西府者視常為尤劇。」[25]借用「直匈奴百年之運」的典故，指稱世仇金朝的衰亡。方大琮（1183-1247）在所擬的策問試題中說：「朔庭雲擾，種類相攻，百年運極，亡可立待。或者以為吾喜，識者以為吾憂。」[26]以「百年運」來指稱金政權擁有的德運，且認為其德運已接近終點，政權覆亡指日可待，這對南宋而言，看似可喜，實則為可憂之事。李劉（1175-1245）在寫給成都路安撫使董居誼的謝啟中說：

> 況值匈奴百年之運，必復《春秋》九世之讎。颱犀札而咤聲旄，在此行矣！……大作三軍之氣，繫單于之頸，慰祖宗在天之靈；犁匈奴之庭，為蠻夷猾夏之戒。[27]

認為金朝衰亂，南宋必將報累世之仇，對於董居誼統兵北上，擊敗金人以申中國之威，充滿了信心與期待。李劉自嘉定六年（1213）擔任成都

25 衛涇撰，《後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以下所引《文淵閣四庫全書》出版資料相同，不另註出），卷 18，〈故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墓誌銘〉，頁 18。程卓卒於嘉定十六年六月，衛涇卒於理宗寶慶二年八月，此一墓誌銘當作於嘉定十七年或寶慶元年。程、衛二人的卒年，見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點校本），卷 40，〈寧宗本紀四〉，頁 780；卷 41，〈理宗本紀一〉，頁 788。

26 方大琮撰，《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8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方良節刻本），卷 29，〈策問・恢復〉，頁 18。

27 李劉，〈謝董侍郎居誼舉狀啓〉，收入不著編人，《新編翰苑新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4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抄本），續集卷 30，頁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董居誼為其長官。[28]此種下級官員對上司的謝啟必然充滿頌揚、誇飾之詞，但其中陳述的理念仍足以反映作者的意向。李劉顯然相信金朝運數已盡，南宋可藉武力一雪前恥，使外夷不敢再侵凌中國。

由於金人南下侵宋是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宋人得知金政權在蒙古軍的攻勢下瀕臨瓦解，則在寧宗嘉定四年（1211）之後。因此，部分南宋士人將金人強盛一時，但佔有中原約一百年即有衰亡之勢，視為運數所定的結果。在「直匈奴百年之運」的典故之上，發展出「夷狄無百年之運」或「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端平元年（1234）年初，蒙古與宋軍聯手殲滅金政權在蔡州的最後勢力，金帝完顏守緒（1198-1234，1224-1234 在位）自殺。京湖制置使史嵩之（1189-1257）在所上〈破蔡擒完顏守緒露布〉中一開始就說：「春秋復九世之讎，在摅宿憤；夷狄無百年之運，果即天誅。」[29]將宋軍的行動定位為復累世之國仇，而以「夷狄無百年之運」，解釋金朝的滅亡是天數所定。露布作者以「九世之讎」對應「百年之運」，顯示此處的「百年之運」具有數字的概念，指的是「一百年的國運」。類似看法亦見於當時方岳（1199-1262）代其長官淮東制置使趙葵（1186-1266），寫給知樞密院事喬行簡（1156-1241）的信：

> 某窮居讀書，嘗竊有歎，以為胡虜無百年之運，國家有十世之讐。事會方來，天怒人怨，一朝顛蹶，噍類靡遺，則既報我祖宗在天之靈，綏我中原遺黎之望矣！[30]

28 魏了翁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影印），卷 79，〈李次琮先生墓誌銘〉，頁 7-8；脫脫等撰，《宋史》，卷 39，〈寧宗本紀三〉，頁 760。

29 鄭真輯，《四明文獻》（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935 年張壽鏞氏約園排印本），卷上，〈史嵩之〉，頁 42。鄭真在《四明文獻》中收錄的〈破蔡擒完顏守緒露布〉有兩個版本，另一個版本的前兩句是「春秋復九世之讎，在申宿憤；夷狄無百年之運，遂即天誅。」兩個版本的文意十分接近。

30 方岳撰，《秋崖先生小藁》，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岳的寫法與前述的「露布」相同，都是認為胡人無百年之運，故金政權在立國一百年之後，即衰微崩潰，全族滅亡。對於南宋士人而言，世仇得報更增加對於自身政權的信心。約在同年，朱復之在寫給趙葵的啟中說：「胡無百年之運，今得自亡；宋接正統之傳，人所共屬。」[31]對比金、宋兩國的命運，認為金朝滅亡正顯示南宋的正統地位，且得到人心的支持。可見「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反映南宋文士對於自身正統的信心。

對於部分南宋士人而言，外夷無法取得正統地位，實為其政權難以長期立足中原的主要原因。在理宗（1205-1264，1224-1264 在位）朝任官的歐陽起鳴，於所著《論範》中說：

> 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惟得正統之傳者能居之。中國者，中國之中國也，夷、夏豈有並立之勢哉！何者？中國乃天地正氣之所會，帝王乃古今正統之所傳，彼其處衣冠禮樂之區，而有聲名文物之教，為天地立心，為民物立極，故能以立乎中國，而中國亦為吾自立之地，宜也。或者非所據而據之；非所有而有之，天未定耳。及其定也，則盛者衰，強者弱，安能以立吾帝王自立地耶！……五胡嘗腥吾中原矣，而異類也，故其勢至於群立其間，忽強而遽弱，方盛而復衰，盜吾中土而無百年之運者，以中國吾之所自立，彼安能以立國乎？王通之帝元魏，惑矣。[32]

據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影印），卷 30，〈代與喬樞密〉，頁 9-10。喬行簡於端平二年由同知樞密院事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此信稱行簡為「喬樞密」而非「喬丞相」，應作於端平元年。

31 朱復之，〈到任上趙制置葵〉，收入不著編人，《新編翰苑新書》，續集卷 10，頁 8。這份啟提到宋軍北上收復故土，又期勉趙葵能像春秋時期秦國孟明一樣戴罪立功，當作於端平元年北伐失敗之後。

32 歐陽起鳴撰，《歐陽論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3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七年〔1471〕賈奭刻本影印），卷上，〈中國帝王所自立〉，頁 4-5。關於歐陽起鳴的生平，目前所知甚少，只知他是閩縣人，於理宗嘉熙二年（1238）考中進士，寶祐元年（1253）擔任別頭試考官。參見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收入宋志英選編，《宋元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 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只有得到正統之傳，行禮樂教化的政權才能久居中國，外夷是「異類」，不具備此種資格，即使憑武力「盜據」中原，其政權也會快速衰弱，無法延續超過一百年。刊刻於理宗淳祐年間（1241-1252）的《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作者呂中在評論金人的滅亡時，也是藉金的衰亡來對照和突顯宋的正統地位：

> 甚矣！上天之意，福華而禍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亂，瑯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以立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裔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盛。然稱王、稱帝，僭號未幾，而敗亡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我中土，污辱我衣冠，似未易撲滅之也。然自崛起以來，甫近百載，骨肉內叛，韃騎外攻，日朘月削，終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蓋自若也。即是而論，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33]

呂中先以東晉與五胡政權相對比，強調東晉國力雖弱，卻立國長久；北方的胡人政權則歷時短暫，足以證明「昔人」主張「夷狄無百年之運」是可信的說法。再以金朝一百年來的興衰過程，說明夷狄看似強大，但具有「正統」的南宋才能長期存在。兩相對照，顯示上天「福華而禍夷」，南宋未來的國運將得到上天庇祐。值得注意的是，呂中只以與東晉同時期的胡人政權作為例證，對於由鮮卑人建立、存在超過一百年的北魏政

出版社，2011 據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影印），卷 32，〈人物類．科名〉，頁 8127；劉克莊撰，王蓉貴、向以鮮校點，《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卷 164，〈丁宋傑墓誌銘〉，頁 4197。歐陽起鳴所著《論範》一書，明代蘇州知府賈奭於成化年間重刊時，更名為《歐陽論範》；蘇州府儒學教授程蘭作序時，稱此書為「元進士歐陽起鳴之所作也」，致使此書長期被視為元代文獻。事實上，《論範》的部分內容收錄於南宋福建人魏天應所編的《論學繩尺》，見魏天應編，林子長箋注，《論學繩尺》，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8 冊，卷 4，〈歐陽起鳴．太宗之美幾成康〉、〈歐陽起鳴．孝宣優孝文〉，頁 76-87。魏天應此書是蒐集南宋科場應答之文，作為士人應試的參考書。由此可知，《論範》一書實為南宋歐陽起鳴所著。

33 呂中，《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卷 26，〈金虜之衰〉，頁 829-830。「信哉斯言乎」一語，點校本作「信乎斯言乎」，應有誤，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初鈔本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略而不提，顯示他選擇性地呈現歷史事實，以證明自己的主張。[34]至於呂中指「夷狄無百年之運」是「昔人有言」，宣稱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說法；一方面強調並非他個人發明這個概念，同時也為「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增添命定或先驗的色彩。不過，由於在南宋以前的文獻中找不到與「夷狄無百年之運」類似的概念，呂中主張此為「昔人有言」的說法恐怕並不正確。事實上，在目前可見南宋人提及「夷狄無百年之運」的各種文獻中，也只有呂中宣稱這是傳統理念。

在金政權滅亡後，南宋隨即面臨蒙古軍更為嚴峻的威脅，呂中強調上天「福華而禍夷」，自是為了增強對抗外夷的信念與決心。面對蒙軍持續的攻勢，此一說法成為當時南宋官員相互安慰的說辭。例如：方大琮在寫給同僚劉震孫（1197-1268）的信中，先提到「西顧憂深，臣子所同」，表達對於四川戰事的憂心，最後則說：「福華禍夷，天道之常。彼飄風不終朝，吉報將至，則念家、慮國之懷可寬，宜少安勿遽。」[35]認為蒙軍的猖獗只是一時，宋有「天道」的庇祐，不久之後必將得到捷報。到了理宗開慶元年（1259），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1198-?）上呈一面在嶺南發現的古鏡至臨安，理宗於是年二月展示給執政官員觀看，宣稱此一古鏡上的鏡文預示「皇天福華禍夷之應」。[36]當時南宋正面臨蒙古軍由大理入侵廣西，李曾伯的主要任務在對抗此一前所未見的威脅。[37]在戎務倥傯之餘，仍不忘進呈讖文，宣揚上天福華的論點，強化抗敵的信心，理宗向執政官員展示古鏡，顯然是認同這樣的作法。

34 嚴耕望稱此類作法為「抽樣作證」，並指這是利用史學作為政治工具的一種主要方法。參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40。

35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 15，〈劉郎中震孫〉，頁 34。

36 李曾伯撰，《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清初鈔本影印），卷 8，〈回宣諭〉，頁 33。

37 關於李曾伯在廣西對抗蒙古的事蹟，參見黃寬重，〈庶無稽屬——宋、蒙廣西戰役的軍情蒐集與傳遞〉，收入氏著，《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195-2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南宋官方的文書中也可見宣揚「天道福華」的例子。景定二年（1261），宋軍收復四川瀘州，城內的蒙軍突圍北走。劉克莊（1187-1269）在獎勵有功官員的制書中寫下：「自蜀有狄難，而識者預言其亂先定，至此而瀘叛平，虜之整居於內者皆去，雖天道福華而禍夷，亦吾師武臣力所致。」[38]將一城之收復，視為蜀亂將定的徵兆，並進而以「天道福華禍夷」來解釋這一場勝利，宣示夷狄不能戰勝華夏的信念。劉克莊在景定三年（1262）任命楊棟出掌樞密院的制文中甚至說：「胡運百年而衰，橫行易耳；王師萬全而出，嘗試可乎？必廣益集思，必深謀遠慮，定鼎復還於郟、鄏，歸疆何止於鄆、讙！偉績可書，令名不朽。」[39]樞密院既為主兵的機構，在任命長官的詔書中，特別強調蒙古國運已然衰落，南宋有恢復故土的希望，期許楊棟在未來對此有所籌劃。對照理宗景定年間（1260-1264）宋、蒙雙方的軍事情勢，蒙古軍因國內有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 在位）與阿里不哥（?-1266）的汗位之爭，而減緩對南方的攻擊，宋軍則持續對駐守四川的蒙軍發動攻勢，企圖收復成都等失土。[40]宋廷在詔書中宣示敵運已衰，故土有望恢復，顯然與當時對軍事情勢的樂觀期待有關。

不過，宋人樂觀的期待並不實際，忽必烈在解決政爭、鞏固統治之後，便積極對南宋用兵；經過數年努力，終於突破宋軍防線。咸淳十年（1274），度宗（1240-1274，1264-1274 在位）去世，幼主即位，由謝太皇太后（1210-1283）聽政，元軍大舉南下，迅速兵臨長江。面對亡國的危機，南宋朝廷仍訴求「上天福華」以激勵人心。是年十一月，謝太皇太后下〈哀痛詔〉，號召官員、百姓起兵勤王：

---

38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69，〈李與趙與檪並陞直華文閣與趙潼川提刑提舉兼運判與檪成都路提刑提舉並權四川制參〉，頁 1830。

39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70，〈楊棟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頁 1857-1858。楊棟被任命為同知樞密院事在景定三年六月，見脫脫等撰，《宋史》，卷 45，〈理宗本紀五〉，頁 881。

40 參見方震華，〈晚宋邊防研究（A.D. 1234-127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咸淳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哀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勳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41]

詔書宣稱，歷史上既然未曾發生外夷統治全部中國的前例，憑藉宋室長久以來的德澤與上天的庇祐，目前也不會產生此種結果，希望軍民能體察「上天福華」的意向，為王室盡力。不過，南宋政府的期待並未實現，14 個月後，元軍逼進臨安，宋恭帝（1271-1323，1274-1276 在位）投降，中國隨後進入「純是夷虜之世」。[42]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因金朝滅亡而發展出「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是宋代夷夏論述上的重要轉折。夷狄的強盛被視為暫時現象，不會超過一百年。尊中國而貶外夷的傳統觀念再度被強調，進而發展出「天道福華而禍夷」的說法，主張宋政權受到上天庇祐而能長期存在。南宋官員對於國運前景的樂觀性論述，在長期對北方強敵作戰的時代中，究竟產生多少激勵人心的效果，實在難以估計。不過，自理宗朝以降，南宋政府持續與蒙古進行軍事對抗，不肯藉由實質或名義上的退讓來換取和議，恐怕與統治階層此種樂觀的期待不無關連。儘管就結果而言，南宋士人對於運數與天道的期待不切實際，這些說法卻對後代的士大夫產生深遠的影響。

---

41 文天祥撰，《文山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許氏藏明刊本影印），卷 17，〈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頁 10。

42 脫脫等撰，《宋史》，卷 47，〈瀛國公本紀〉，頁 937-9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南宋以後的流傳

元滅南宋後，上述提及「夷狄無百年之運」的文獻並未受到政治力打壓，仍得以繼續刊印流通。像是呂中的《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十分受到元代書肆的重視，其部分內容被分散抄錄在當時以編年方式記述宋代歷史的著作，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之中。[43]心懷故國的南宋遺民更是藉由歷史著作來表達故國之思，傳達推崇中國、貶斥夷狄的思想。其中，闡發朱熹《通鑑綱目》之微言大義的著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44]朱熹修撰《通鑑綱目》的目的，是藉歷史述事，表達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評價，闡揚理學的價值觀念。朱熹死後，後學紛紛撰寫《發明》、《發微》，具體而詳細的發揚、闡述他們所認知的朱子著述之意，而「夷夏之防」則為其中一項重點。例如：尹起莘於南宋末年作《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主張《通鑑綱目》的著述是為了「有補於世教」，其中的重點有四項：

> 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45]

尹起莘認為尊崇君父、正統、名節和中國，貶斥亂賊、僭偽、邪佞和夷狄是關係到「綱常」的大事，也是朱熹用心之所在。由此看來，朱熹撰述《通鑑綱目》的核心關懷被定位為正統。因為唯有確認正統與僭偽之分，才能明辨君父與亂臣，決定名節與邪佞的差別；而中國與夷狄之別，

43 參見張其凡、白曉霞，〈南宋史籍中興大事記講義的發現及其價值〉，附錄於《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頁 896。

44 對這個議題的概括性討論，參見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53-71。

45 尹起莘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收入《通鑒史料別裁叢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據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本影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頁 2。尹起莘生平不詳，魏了翁曾為其所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一書作序，則此書應刊行於南宋寧宗朝後期或理宗朝初期。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56，〈通鑑綱目發明序〉，頁 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是與正統息息相關。

到了元代，劉友益（1248-1332）編撰《資治通鑑綱目書法》，所闡述的重點與尹起莘幾乎一致。劉友益是入元的南宋士人，在宋亡之後不求仕宦，閉門讀書，耗費約 30 年的時間完成此書。[46]根據揭傒斯（1274-1344）所撰的序文，劉友益撰述目的在宣揚朱熹撰寫《通鑑綱目》以尊崇「正統」政權的用心：

> 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47]

揭傒斯認為朱熹撰寫《綱目》的重點在於以蜀漢、東晉為正統，而貶抑曹魏與元魏的地位，這是不可更改的「至公之論」。但是，當時仍可見到與朱熹相異的論點，遂促使劉友益撰寫《資治通鑑綱目書法》，以闡明朱熹著述之意旨。劉友益既然以正統觀作為寫作的核心，書中便蘊涵尊中國、貶夷狄的思想，例如：劉友益針對《通鑑綱目》所記漢宣帝甘露三年（51 BC）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至長安朝見宣帝一事，提出以下的議論：

> 匈奴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三年始書單于至，宣帝五鳳四年始書稱臣，今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48]

---

46 劉友益的生平，見揭傒斯撰，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文集卷 8，〈劉先生墓誌銘〉，頁 456-457；王禮撰，《麟原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前集卷 6，〈遂初堂記〉，頁 6-8。

47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 3，〈通鑑綱目書法序〉，頁 311-312。

48 劉友益撰，《資治通鑑綱目書法》（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原北京圖書館藏元坊刊本殘本微捲），卷 5，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初班固以「直匈奴百年之運」解釋單于來朝的原因，劉友益對於相同史事的評論改為「信哉！無百年之運也」，顯然是以匈奴向漢朝稱臣，證明「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無誤，而無視於匈奴自建國到向漢宣帝稱臣朝見，已有 165 年之久的史實。由此看來，劉友益有意藉匈奴的歷史傳遞南宋晚期發展出來的夷夏觀，即使這樣的觀念未必合於史實。值得注意的是，劉友益的《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在元代頗受重視，仕於元廷的知名士人揭傒斯、歐陽玄（1283-1357）和許有壬（1287-1364）皆為其撰寫序文，歐陽玄並協助刊刻本的校正工作。[49]馮翼翁（1292-1354）後來將《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帶至京師，得到國子監教師的重視，官學的學生皆傳習此書。[50]從劉友益的例子可以看出，元代統治者的外族身分，並無礙於「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在士人群體中的書寫與流傳。

等到元朝末年政局紛亂之時，「夷狄無百年之運」就成為南方反元人士起兵的理由。例如：章子善勸說據有浙東的方國珍（1319-1374）公開反元，全力擴張自己的勢力：

> 公〔方國珍〕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縱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襼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歐、越可傳檄而定。」[51]

認為夷狄政權無法超過一百年，元朝的國運即將告終，方國珍不應再接

49 歐陽玄撰，湯銳校點，《歐陽玄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圭齋文集卷 7，〈盧陵劉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頁 137-138；許有壬撰，《至正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215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卷 30，〈綱目書法序〉，頁 2-6。現存的元代坊刊本《資治通鑑綱目書法》殘本，在每卷的卷首題「盧陵後學劉友益修撰、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歐陽玄校正」。

50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 8，〈劉先生墓誌銘〉，頁 457。

51 宋濂撰，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翰苑別集卷 10，〈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頁 1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元政府號令，而應利用水軍的優勢，掌控糧運並向外擴張。不過，方國珍並未接納這樣的建議。在各路反元領袖中，積極利用運數之說，進行政治宣傳的是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他在掃平南方群雄後，以「夷夏之防」作為反元的主要訴求，宣稱由外夷建立的元政權運數已盡，藉此說服北方忠於元室的軍民放棄抵抗。[52]至元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發動北伐，傳檄北方各地，號召元的軍民歸順：

> 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53]

主張蒙元的入主中國是天命所授，故其衰亡不只是因為統治者的腐敗、殘暴，更是由於上天已捨棄元的德運，外夷無法立國百年的預言將要實現。顯然，朱元璋利用「胡虜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宣稱漢人政權復起為無法抗拒的運數。在將元順帝（1320-1370，1333-1370 在位）逐出北京後，面對中國境內殘餘的元朝勢力，朱元璋仍繼續使用「胡虜無百年之運」的訴求，例如：洪武五年（1372）招降元將白瑣住的詔書一開始就說：

> 朕惟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古語云：「胡無百年之運」，爾讀書者，安得不知。自五季亂華以來，胡人雖欲竊據中國，未嘗有過百年之數者。今元運既及百年，其數已盡，古語可謂驗矣。[54]

---

52 關於朱元璋在有效控制中國南部後，改以夷夏觀作為推翻元室的主要訴求，參見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31-233。

5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太祖實錄〉，卷 26，「吳元年十月」，頁 401。

54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 57，「洪武五年七月」，頁 1387。洪武年間其他提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宣稱自五代以來，胡人政權入據中國皆未能超過一百年，此一史實讀書人皆能知悉，元政權立國既已百年，運數即將告終。相較於之前的北伐詔，更強調「胡無百年之運」根基於歷史事實，乃是確然可信的預言。

在明政府掃除殘元勢力之後，作為政治宣傳之用的運數論也就不復出現於政府文書，而是透過明人記述本朝歷史的各種著作，持續流傳。[55]前述至元二十七年十月的檄文，尤其受文章家的重視。弘治年間（1488-1505），程敏政（1445-1499）編《皇明文衡》即列此檄文為全書之首，並冠以〈諭中原檄〉的篇名。[56]另一方面，明中期文臣於奏書中引用「胡虜無百年之運」，則是出於與之前不同的動機。余珊在世宗嘉靖四年（1528）上奏，指當時國家面臨十項危機，其中第四項為「夷狄漸強」：

> 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無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為嚮背耳。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虜入雲中、注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間，上谷、中山之師，

「胡無百年之運」的文書或詔令，包括洪武二年致元順帝書，見徐學聚，《國朝典彙》，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64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啟四年〔1624〕徐與參刻本影印），卷 1〈開國〉，洪武二年十月，頁 90-91；洪武四年詔諭遼東吶哈出，見徐學聚，《國朝典彙》，卷 1〈開國〉，洪武四年六月，頁 104-105；洪武七年召諭雲南，見孔貞運輯，《皇明詔制》，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5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卷 1，頁 56-424~56-425。

55 明中期以後編成的史著中，收錄「胡無百年之運」之說者頗多，僅舉兩例：雷禮等輯，《皇明大政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8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1602〕秣陵周時泰博古堂刻本影印），卷 1，「吳元年十月丙申條」，頁 54-55；呂毖輯撰，《明朝小史》，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第 19-20 冊（臺北：正中書局，1981 據清初刊本影印），卷 1，〈洪武紀．中原傳檄〉，頁 1 之 13-14。

56 關於〈諭中原檄〉在明代受到推崇、廣為流傳的過程，參見劉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中國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北京），頁 83-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帳連韝，未百年也，而有五胡之雲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吞，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亂，吐番刼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弭兵。又未百年而女真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綱常再肅。及土木之難，曾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57]

余珊指出中國與外夷，有如陽與陰之相互依存，與前述南宋高宗的論點相近。不過，他從漢代以降外夷政權的興衰歷史，歸納出胡虜「無百年之運」，亦「無百年之衰」的結論，卻較能貼近歷史發展的真相。顯然，若要從中國與外族的互動歷史中，尋找夷夏關係變化的「規律」，就不能只注意外夷的衰弱而忽視其興起。相對於南宋末年的士人，因預言外族政權不能超過百年，而擁有「天道福華」的自信；余珊則視「夷狄無百年之運」為一種警告，提醒朝廷必須注意外夷即將崛起，可能造成的威脅。

在政府文書之外，明代後期出現一些有關南宋遺民的著作或傳說，繼續提及「夷狄無百年之運」，更強化當時人對此一說法的信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據稱由南宋遺民鄭思肖（1241-1318）所作的《心史》，於崇禎十一年（1638）在井中被「發現」後，隨即刊刻流傳。書中嚴厲批評蒙元政權，也以「胡無百年之運」預言蒙古政權的衰亡：

> 自古夷狄兇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強、最逆。上下好色貪利，

57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4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卷 167，〈余兵使奏疏．陳言時政十漸疏〉，頁 6-7。參見《明實錄》，〈世宗實錄〉，卷 54，「嘉靖四年八月」，頁 1328-1329；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點校本），卷 208，〈余珊傳〉，頁 5495-54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韃靼人亦自怨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盛凡六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58]

在明政權正面臨滿洲與流寇雙重威脅的時代，此一強調華夷之辨，預言蒙元運數有限的作品，立即受到諸多官員、士人的重視。[59]在崇禎十三年（1640）應天巡撫張國維（1595-1646）刊刻《心史》時，馮維位又在書末加上一個馮氏祖先馮友仁在宋亡之後拒絕出仕元朝，並以「胡虜無百年之運」，勉勵子孫為故國報效的故事。馮維位宣稱友仁的行事、志節與鄭思肖相近：

> 余先忠靖古淡公友仁，先孝子廿六世孫也，時以溧陽廣文綰溧篆。集諸生，號慟於明倫之堂，焚印綬遁歸。……戒族姓毋胡俗，毋胡士。故終元世九十三年，而余家耕田讀書，稱「宋里」，斯不亦心先生之心者耶！歸三十四年，而子徵士公道傳生，生十六年而公卒，遺命有「胡虜無百年之運，韓亡，子房奮，勉報宋恩，以畢吾志」之語。斯不亦志先生之志，無慚二檄者耶！迨我太祖駐師積道山，道傳齎牛酒迎犒，出語人曰：「吾屬有真主，吾父之志畢已。」首轉八百石餉，以老不受官，而服賜衣以歸。[60]

文中所記預言元代國祚不及百年的馮友仁，與提供朱元璋軍需糧食的馮道傳，其事蹟皆不見於之前的文獻，隨後則被收入《義烏縣志》。[61]因

58 鄭思肖撰，《心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崇禎十三年〔1640〕汪駿聲林古度刻本），〈大義略敘〉，頁 34-35。

59 根據陳福康的考證，在明、清之際有 90 多位文人在詩文作品中提到《心史》，可見此書影響之深遠。參見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 173-239。

60 馮維位，〈書心史後〉，收入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附錄一・序跋〉，頁 299-300。

61 熊人霖增修，《（崇禎）義烏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17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 影印明崇禎年間刻本），卷 15，〈人物傳・馮友仁〉，頁 12-13。馮友仁之名雖見於《（萬曆）金華府志》，但只列於宋代「明經入仕」之人名表中，完全不涉及生平事蹟。直到熊人霖增修《義烏縣志》，才將馮友仁與馮道傳的傳記收入。擔任義烏知縣的熊人霖，於崇禎十三年六月撰寫〈義烏縣志序〉，可見《義烏縣志》的增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不論馮維位所述是否為歷史事實，他宣稱的祖先故事，無疑是在政府文件之外，更進一步地宣揚「夷狄無百年之運」的理念。

在明末內憂外患交迫的局勢中，此一預言外族政權不超過百年的說法，也影響當時人對時局的判斷。例如：知名士人陳子龍（1608-1647）在崇禎九年（1636）論及對抗滿洲人的策略：

> 使天果佑順，而良臣得策，我內無潢池之警，外修耕戰之資，又以餘力收繫北虜，則數年之間，奴必有中變。或分為二庭，或散為數部，制之易矣。或曰：「姚塔雄猾，恐終有遼土，為中國患。」是不然，虜無百年之運，苟內亂矣，其能再興！昔俺答之時，其子黃台吉屢寇宣、雲，議者以俺答不足懼，使黃酋旦夕得虜柄，則不可當。然受款而後，黃酋老悖無能為也。嗟乎！為國者在於自強而已，奈何有畏敵之心，而無憂敵之志哉！[62]

認為主政者要先設法「自強」，即先解決流寇問題，靜待滿洲人發生內亂，由於夷狄的國運有限，經歷內亂之後即不能再度振興，將能輕易加以處理。如同南宋末年，「虜無百年之運」的說法給予明末文人對抗外族的自信心。

在明代滅亡後，清政府曾藉由嚴厲的文字獄，以及編修《四庫全書》時任意刪改文獻內容，意圖消滅尊中國、貶外夷的思想。例如：前述南宋李曾伯在《可齋雜稿》中提到宋理宗出示廣西上呈古鏡，因其鏡文宣示「皇天福華禍夷之應」，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可齋雜稿》中，被改寫成「皇天福緣禍因之應」。[63]可見四庫館臣有意抹滅古籍中「福華

與張國維刊刻《心史》幾乎同時，收錄馮友仁事蹟顯然是受到撰寫馮維位〈書心史後〉的影響。馮友仁之名，見王懋德修，陸鳳儀纂，《（萬曆）金華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77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20，〈賢良入仕〉，頁 18。

62 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安雅堂稿卷 11，〈問制奴之策〉，頁 1256。

63 李曾伯撰，《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9 冊，卷 8，〈回宣諭〉，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禍夷」的思想，不惜將原書的文句改得難以解讀。不過，由於「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存在於諸多文獻之中，清政府的努力不足以徹底阻止此一觀念持續傳流。[64]像是呂中的《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在道光年間（1821-1850）依然有抄本流通，而且前述記載「夷狄無百年之運」與「皇天福華禍夷」的內容皆未遭到刪除。[65]儘管清政權的統治歷時長久，遠遠超過一百年，足以證明「夷狄無百年之運」絕非可信之預言；但當清末革命運動興起之時，革命黨人仍援引「夷狄無百年之運」來宣傳滿清政權將亡。光緒三十一年（1905），同盟會成立，參與者在入會時皆須書寫盟書;盟書上的繫年,以「天運」為年號。據馮自由(1882-1958)的記載，革命領袖孫中山（1866-1925）選擇「天運」作為新年號的一個理由是：

> 語云：「胡人無百年之運」，滿族占據華夏將三百年，其運祚亦已告終，此后即為漢族中興之運。「天運」二字即漢興、滿亡之表示，其意義極為深長。[66]

宣稱滿洲人佔有中國已近三百年，已超過「百年」之數，故其「運祚」已終，漢人政權即將興起。孫中山既有意效法明太祖以「驅逐韃虜」作為革命行動的目標，採取朱元璋慣用的「胡人無百年之運」，來宣稱外族政權即將告終，自然不令人意外。[67]至於此預言外族政權不能超過一百年的說法是否合乎實際狀況，政治運動者顯然並不在意。

---

64 關於清代文字獄所造成的影響，最新的研究是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在頁 612-613 對於民間抗拒政府查禁的各種力量或方式有所討論。

65 呂中，《皇朝中興大事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卷 8，〈金虜之衰〉，頁 10-11。此鈔本書末有「道光辛卯歲武原馬氏漢唐齋收藏書籍」之印，可見是在道光十一年被收入漢唐齋的藏書之中。

66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 459-460。

67 關於孫中山視明太祖朱元璋為「民族革命」的典範，參見劉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頁 96-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追溯「百年之運」一詞的語義演變，可以看出儘管班固在東漢即以「直匈奴百年之運」來描述外夷政權的衰弱；但將「百年之運」明確定義為「一百年的國運」，是北宋才出現的現象。至於「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更是在金代滅亡後才發展出來，實不足以代表整個宋代的夷夏觀念。南宋晚期士人在慶幸金室滅亡，世仇得報之餘，進一步宣稱所有的夷狄政權都難以存在超過一百年。此種理念曾給予南宋人長期對抗外族的信心，其後又因元代統治不及百年即衰亂崩解，而成為反元政治人物引用的口號。由於此一運數論之說，是因政治目的而產生，如同歷史上許多預言式的說法，傳述者以後見之明歸納出所謂的「規則」，再藉先驗的形式加以包裝。也就是說，不論在南宋或元末，宣稱「夷狄無百年之運」的官員或士人都是已觀察到金、元成立約一百年即告衰亡的事實，再宣稱此一運數之說預言了金、元政權的結束。至於他們提出證明此一「規則」的史實，根本禁不起檢驗。傳述者只是從記載中擇取能夠支持其主張的史實作為「證據」，而不在乎這樣的理念是否符合歷史的完整面貌。正如明代余珊指出，分析中國與外族互動的歷史，不能只注意外夷的衰落而忽視其興起，「胡虜無百年之運」與「胡虜無百年之衰」實為一體之兩面。但是，對多數提及此一運數之說的作者而言，歷史真相並非他們關注的重心，以致余珊的說法有如空谷足音。

因此，「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之所以能夠持續且廣泛流傳，並非此說能正確顯示「歷史規律」，而是因為此一理念具有普遍性的意涵，可以輕易地被不同時代的政治人物所利用，在王朝更替之時，增強漢人對抗外夷的意識與信心。仔細分析「夷狄無百年之運」之說形成和流傳的歷程，具體顯示出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利用運數之說影響對外政策或現實政治。北宋時期，蘇頌等人想藉運數論說服君主放棄對外用兵的野心；南宋晚期，呂中等人提出「夷狄無百年之運」，來建立對自己政權的信心，強化抗蒙意識，明太祖君臣藉此一運數論來說服蒙元殘餘勢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投降，到了明中葉，文臣余珊重提此說，目的在呼籲朝廷重視邊防。至於清末的革命運動家利用「胡人無百年之運」來宣稱清的國運將終，既顯示滿清政府壓制漢人夷夏意識的失敗，也代表政治人物並不在意史實，無視清代立國早已超過二百年，仍然宣稱「胡人無百年之運」。由此可見，政治人物利用歷史知識的方式多元而靈活，但此種選擇性陳述史實的方式，實際扭曲了後世對於歷史的認知，造成政治宣傳建構歷史論述的結果。

*本文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士人與近世社會文化變遷（1100~1500）」計畫的研究成果。本人在撰寫期間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的補助，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訪問研究，得以利用該所豐富的學術資源，特此一併致謝。

（責任編輯：歐陽宣　石昇烜　校對：洪麗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不著編人，《新編翰苑新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4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抄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孔貞運輯，《皇明詔制》，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5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尹起莘，《資治通鑑綱目發明》，收入《通鑑史料別裁叢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據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本影印。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許氏藏明刊本影印。

方　岳撰，《秋崖先生小藁》，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影印。

方大琮撰，《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8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方良節刻本。

王　昶輯，《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

王　禮撰，《麟原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王懋德修，陸鳳儀纂，《（萬曆）金華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77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點校本。

呂　中，《皇朝中興大事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

呂　中撰，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與《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合刊。

呂　毖輯撰，《明朝小史》，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第 19-20 冊。臺北：正中書局，1981 據清初刊本影印。

宋　濂撰，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李　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

李　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李　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點校本。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李延壽，《南史》。臺北：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李曾伯撰，《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1970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曾伯撰，《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清初鈔本影印。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杜　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點校本。
徐　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徐學聚，《國朝典彙》，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64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啟四年（1624）徐與參刻本影印。
班　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點校本。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點校本。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收入宋志英選編，《宋元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 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據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影印。
脫　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點校本。
許有壬，《至正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215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
郭茂倩輯，《樂府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汲古閣刊本影印。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4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影印。
陳子龍，，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揭傒斯撰，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葉　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雷　禮等輯，《皇明大政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8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據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1602）秣陵周時泰博古堂刻印本影印。
廖道南，《楚紀》，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48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李桂刻本影印。
熊人霖增修，《（崇禎）義烏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17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 影印明崇禎年間刻本。
趙　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劉友益撰，《資治通鑑綱目書法》。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原北京圖書館藏元坊刊本殘本微捲。
劉克莊撰，王蓉貴、向以鮮校點，《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歐陽玄撰，湯銳校點，《歐陽玄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歐陽起鳴，《歐陽論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3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七年（1471）賈奭刻本影印。
衛　涇撰，《後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鄭　真輯，《四明文獻》。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935 年張壽鏞氏約園排印本。
鄭思肖，《心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影印明崇禎十三年（1640）汪駿聲林古度刻本。
鄭思肖著，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影印。
魏天應編，林子長箋注，《論學繩尺》。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二、近人研究

方震華，〈晚宋邊防研究（A.D. 1234-127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莊吉發，〈他山之石——朝鮮君臣論盛清諸帝〉，收入李國祁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頁 75-10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張其凡、白曉霞，〈南宋史籍中興大事記講義的發現及其價值〉，附錄於《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頁 885-8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黃寬重，〈庶無稽屬——宋、蒙廣西戰役的軍情蒐集與傳遞〉，收入氏著，《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頁 195-23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0。
劉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中國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北京，頁 79-100。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
近藤一成，〈宋代永嘉學派葉適の華夷觀〉，《史學雜誌》第 88 卷第 6 期，1979 年 6 月，東京，頁 5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0 (December 2017), pp.159-19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60.04

Non-Han Regimes Never Last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nalyzing a Prophe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steppe Relationship

Fang, Cheng-hua*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many historic interpretations were given after the end of each dynasty, which described the fall of a regime as the result of its predicted destiny rather than analyzing the substantial factors causing the dynastic extinction. This kind of prophecy usually became less popular after a short period, as later historians would never mention it in their writings. However, the concept that regimes ruled by non-Han tribes never last over one hundred years is an exception. This idea appeared around the 1230s, as the Southern Song literati enthusiastically witnessed the decline of their long term rival—the Jin Dynasty, which established by the Jurchens. Although the Jurchens once controlled northern China by their strong military forces, some Song literati argued, their state came to end in only one hundred years, contrasting the fact that the Song Dynasty which obtains the "orthodoxy" still exists. The extinction of Jin Dynasty provided the Song people confidence in the Heavenly support, and concluded a principle that no non-Han regime would ever obtain the good fortune to exist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This statement became even more popular after the Yuan dynasty, as the rebellions overturned the Mongol regime during the time its rule over the whole Chin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chfa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rsisted less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fou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used this concept for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inevitable. Thus, political propaganda is the primary factor causing this prophecy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and this fact also demonstrates how political agenda influenced historical discourse.

Keywords: destiny, sino-steppe relationship,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Yuan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